

习近平家语

要引导党员、干部向焦裕禄同志看齐,从今天做起,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像焦裕禄同志那样对待群众、对待组织、对待事业、对待同志、对待亲属、对待自己,像焦裕禄同志那样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努力

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在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3月18日),《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家视界

密室剧本杀亟待开启“青少年模式”

· 阅读提示 ·

剧本杀和密室逃脱中虚构的情景与刺激的体验感让学生们暂时逃离现实、缓解压力、获得愉悦,这也正是近年来这一社交娱乐项目日益受到青睐和被踊跃体验的原因。但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来看,此类社交娱乐项目存在诸多弊端,亟待政策法规出台予以规范监管。今年3月1日,全国首个《密室剧本杀内容管理暂行规定》在上海正式施行,为杜绝未成年人保护存在“隐秘的角落”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高越

近年来,剧本杀和密室逃脱等社交娱乐项目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青睐和踊跃体验。但行业日益“走红”的背后,伴随着未成年人保护缺失、安全隐患、剧本内容违禁等一系列问题出现。未成年人因体验密室逃脱或剧本杀后出现心理疾病的案例不在少数。

今年3月1日,全国首个《密室剧本杀内容管理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在上海正式施行。《规定》指出,密室剧本杀文化业态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对不适宜未成年人参与的密室剧本杀活动,经营单位应当在显著位置或活动前予以提示,并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密室剧本杀行业仍处于自由发展阶段。专家们建议,《规定》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社会保护的相关规定,值得借鉴和推广,让未成年人保护再无“隐秘的角落”。

沉浸式社交备受未成年人青睐

近来,秦皇岛市第一中学高一政治课老师常思敏发现,学生们总凑在一起讨论剧本杀、密室逃脱等新型社交娱乐项目。她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我们班64个人,有50多名学生都玩过。”更令她担忧的是,“在各类剧本杀里,学生们最倾向恐怖本和情感本。”

密室剧本杀文化业态是指,根据一定的故事剧情,提供剧本、机关密室、实景场地中的一种或多种,以逻辑推理为主,供消费者之间互动或消费者与场所工作人员互动的文化体验形式。

去年,艾媒咨询发布的《2021年中国剧本杀行业发展现状市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10岁至19岁城镇人口是剧本杀行业潜在消费人群。2022年1月,中国青年研究中心发布的青少年沉浸式娱乐方式与权益保护调研也显示,超过65%的青少年偏向喜欢密室逃脱、剧本杀,其中,初中生比在职青年高出8%。

另有调查发现,近四分之一的密室经营者未向未成年人作出不宜游玩恐怖密室等提示,近四分之一的剧本杀店家未就适宜未成年人的剧本内容给予提示。

密室逃脱和剧本杀两者有何不同?“身经百战”的学生们“研究”得很清楚。他们告诉常思敏,二者都对思维有很高的要求和考验,相比之下,密室逃脱更烧脑,而剧本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放松压力的效果,更适合认识新朋友、促进朋友关系。



青少年正成为剧本杀的主要消费群体。

为什么热衷于这样的娱乐活动?他们告诉常思敏,由于学习任务重、课业压力大、家长缺乏理解,再加上独生子女的孤独感和急于长大成人的愿望等心理因素,让学生普遍觉得,在游戏过程中的体验和与同龄人沟通交流成了排解压力的好方式。

除了是朋友相聚的好去处,学生们还觉得,通过玩这类游戏能实现与角色共情。“玩家在剧本杀的过程中自由塑造人物角色,这既能够满足大部分人的表演欲,又能让玩家有强烈的沉浸感。”

虽然青少年正成为剧本杀的主要消费群体,但采访中记者发现,一些体验过这类活动的成年人均表示,这类游戏并不适合未成年人。

就读于上海一所大学的张同学认为,剧本杀、密室逃脱这类游戏更像成人版“过家家”,确实能起到锻炼思考能力和辩论能力以及提高社交能力的作用,但这类游戏很昂贵,并不适合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玩。她发现,进入这类场所基本不需要核查身份证,她建议,“女孩尽量不要和陌生人去玩,因为在密闭空间内很容易发生不确定的情况”。

家住北京的杜先生是一名热衷剧本杀的家长。他认为,“16岁之后体验这类游戏更合适,因为不同的剧本内容对孩子产生不同的影响,特别是涉及恐怖、暴力、血腥内容的剧本会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

所谓负面影响并非只是家长猜测。学生们告诉常思敏,实际体验中,确实有一些令他们“不舒服”的场景,比如一个叫《酒大奇迹》的剧本,里面需要玩家喝酒;一个叫《殇》的剧本,有的店家会在玩的过程中撒“骨灰”;在一些密室逃脱场所,店家安排很多NPC(非玩家角色)恶意吓人。有的学生直言,体验游戏之前,有时

很难甄别某个剧本是否适合未成年人。

除了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不少剧本杀门店还存在较大消防隐患。曾有媒体报道,山东某密室未办理消防安全等检查验收,发生了12岁女童被道具卡住颈部窒息而亡的事件。记者在走访中也注意到,一些门店为营造沉浸式效果吸引客源,不仅店内灯光昏暗、格局复杂,甚至没按消防要求张贴安全出口引导标志,一旦有火灾等紧急情况发生,不利于玩家安全逃生。

用监管力量扫除剧本杀行业隐患

在资深出版人、图书策划人余一途看来,密室剧本杀这类游戏主要以悬疑推理解谜为主,但部分游戏充斥暴力、凶杀甚至色情内容。“由于市场准入门槛低,大量创业者的涌入,市场竞争激烈,大量从业者为了提高行业竞争,以重口味恐怖猎奇软色情等内容吸引客户。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游戏中错误价值观的影响。”

虽然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五十条规定,禁止制作、复制、传播含有宣扬淫秽、色情、暴力、邪教、迷信、赌博、引诱自杀、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图书、报刊和网络信息等。但由于该类行业市场发展较快,以及从业者素质和监管相对落后,针对密室类游戏场所的监管存在一定盲区。

广州市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郑子殷律师曾注意到一个案例:2020年,广西南宁一名12岁男孩和同学去玩密室逃脱游戏,由于游戏内容过于恐怖出现身体不适,住院治疗后被诊断为惊吓过度。

郑子殷提出,在监管上,没有对剧本杀和密室逃脱游戏的类型、表现形式划分

界限,导致了部分商家为博取生意设计如血腥、暴力、恐怖惊悚、迷信等情节和内容。由于没有专门机构对剧本杀予以监督,监管处于真空状态。

在郑子殷看来,上海出台的《规定》有很多积极内容可供各地参考借鉴。“首先,《规定》明确了内容审核主管单位,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负责对全市密室剧本杀内容文化业态的内容予以规范和监管;其次,从法律角度明确规范密室剧本杀内容,如第六条明确规定了十大类不得出现的情形;最后,《规定》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社会保护的相关规定,如第八条明确了密室剧本杀文化业态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护机制,注重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对不适宜未成年人参与的密室剧本杀活动,经营单位应当在显著位置或活动前予以提示,并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郑子殷说,“接下来,有关监管部门要加强日常巡查,包括对实际经营中的剧本内容是否符合《规定》要求等,切实执行到位。”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闵行区副区长刘艳建议,应以未成年人保护为切入点,加快建立密室剧本杀行业监管制度,从国家层面强化顶层设计,细化未成年人内容、场所、时间分级,加强从业人员管理和引导,强化对经营活动的监管合力,用监管力量帮助行业扫除隐患,促进整个行业健康发展。

家长可选择优质游戏与孩子共同参与

因为玩剧本杀跟父母发生冲突怎么办?未成年人热衷剧本杀,面对这类场所存在的诸多隐患,家长和学校应如何有效引导?

常思敏建议学生们在体验这类游戏时,要学会分清现实与虚拟,注意合理分配时间,避免过度沉迷。“游戏中虚构的情景与刺激的体验感成为学生们暂时逃离现实、缓解压力、获得愉悦的主要方式,但未成年人需要在家长和教师等成年人的引导下,增强辨别暴力血腥、过分恐怖等不适合未成年人内容的能力。”常思敏说。

“剧本杀对孩子的成长并非全无益处,优质的剧本可以丰富孩子的想象力,提高孩子的思维和社交能力,学习历史文化知识,提升逻辑思维能力。”余一途建议,学校一方面应加强对孩子的心理疏导,通过一对一、心理老师讲座等形式,对已经受到剧本杀负面影响的孩子做心理疏导。同时,可建立相关兴趣社团,积极提供符合青少年价值观的优质剧本杀内容。

在家中,余一途建议,家长应及时发现孩子的负面情绪并沟通,如发现情况严重,可联系心理咨询机构或医院做专业疏导,切忌批评责骂。“线上剧本杀平台有较多优秀三人剧本,家长可先行体验,筛选优质游戏与孩子共同参与。”

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庄晓宇认为,青少年对父母的依赖会逐渐减弱,因此,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应注重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只有亲子关系比较亲密,可以平等交流、互相尊重,孩子才能更好地思考、听取家长的建议。”庄晓宇认为,“如果孩子能在家庭和学校环境中得到价值观的认可和对正面的反馈,并接触到更具建设性的文体活动,将不会沉迷于在剧本杀等游戏中寻求心理满足。”

“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大家谈”⑦

石鑫

工作和家庭是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两翼,缺一不可。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或多或少都会感受到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一些推崇996工作制、“奋斗者文化”的企业中,劳动者的正当休息权常常被忽视,导致工作家庭冲突愈发严重。经合组织2020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包括发达国家,以及中国、印度、南非的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人的带薪工作时长排名第3位。工作和家庭冲突这一问题严重影响民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安全感,成为制约生育意愿的直接因素之一。

事实上,工作和家庭并不是简单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家庭不等于休闲,而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场域,是社会得以维系的基础。马克思早就指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既是劳动力恢复的过程,也是新的劳动力形成的过程。因此,过度的工作家庭冲突,不仅会损害家庭的利益,也会损害劳动力的价值,进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从性别视角看,由于女性承担了更多无酬的家庭照料劳动,工作和家庭冲突更为严重,加剧了性别的平等。一些当代学者指出,满足工作和生活需要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只有社会把满足这种权利作为普遍的价值观念,才能实现工作家庭的平衡,减少家庭成员的压力和焦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和发达国家开始从国际公约和国家立法的角度肯定劳动者有平衡工作家庭的权利,明确用人单位有帮助员工平衡工作家庭的责任,推动构建家庭友好和性别平等的工作场所。1981年,国际劳工组织下发第156号名为《有家庭责任工人公约》的文件,首次提出政府应采取促进有家庭责任的男女员工的机会均等和待遇平等,为兼顾工作和家庭责任提供了框架。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妇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明确了企业应承担的促进员工平衡工作家庭的责任。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芬兰、日本等国通过立法和公共政策,指导用人单位采取弹性工作时间、休假政策、儿童照顾等措施帮助员工协调家庭照料者与劳动者的角色。这些文件和行动为更多用人单位打造家庭友好和性别平等的工作场所设立了模板和方向。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调整,用人单位在优化婚育友好的社会环境中的责任日益明晰。《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等政策文件都提出,用人单位要将生育友好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方面,鼓励支持用人单位采取提供托育服务、灵活休假和弹性工作制等措施,帮助职工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这些文件明确了用人单位打造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的具体途径。

一是严格落实生育假制度。用人单位是落实员工生育假待遇的重要主体。三孩政策调整后,各地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普遍延长了产假、陪产假和育儿假,并明确要求假期期间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不变。目前在大部分省市,生育保险只能覆盖女员工的产假津贴,陪产假和育儿假期间的工资需要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条例还规定夫妻双方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调整假期分配,以及未休假期可以顺延使用等灵活措施。这就意味着用人单位对于员工如何休生育假有了更多的决定权,可以直接影响男女员工的生育意愿。因此,依法保障员工产假和育儿假期间待遇,是用人单位支持员工生育养育的最主要途径。

二是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开展托育托管服务。生育政策调整后,政府将企业等用人单位参与提供托育服务作为托育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2021年6月,发改委等部门印发的“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指出支持工业园区、用人单位等新建、改扩建托育服务设施,普惠托育向社会开放提供。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先行探索,如在大型国企、科技园区开办托育托管机构,为符合条件的企业提供经济补助等。北京、上海等地一些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也响应政府和工会号召开办托育托管服务。由于用人单位提供的托育服务能够更贴合员工的工作实际,如假期托管、晚送晚接和夜间托育等,受到员工的普遍欢迎。有条件的用人单位提供托育托管服务,可以增加普惠性托育服务资源,是公立和私立托育服务之外的重要补充。

三是探索弹性工作制。弹性工作制是指员工在保证工作时长或工作量的前提下,可选择提前或延迟时间上下班,或采取居家或远程办公方式完成工作任务。弹性工作制在发达国家已有广泛应用。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英国、美国、德国、瑞士等国家的企业纷纷采用弹性工作制。由于弹性工作制可以使员工有更灵活的时间处理个人和家庭事务,被认为是一种人性化的、家庭友好的工作制度。到2013年,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已有约87%的公司为员工提供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在我国,近年来北京、深圳、浙江等一些省市先后出台过错峰上下班、周五弹性休假等弹性工作相关政策,发现弹性工作制在减少通勤时间等方面有积极效果。一些民营企业开展的远程办公试验发现,弹性工作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可以减轻员工育儿压力,促进男性员工更多分担家务,有助于减轻职业发展和育儿的冲突。可以说,弹性工作制是全球发展趋势,用人单位在采用弹性工作制帮助员工平衡工作家庭方面有很大的自主空间和发展潜力,可作为打造家庭友好型工作场所的发展方向。

从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可以看出,用人单位在打造家庭友好的社会环境中大有可为。用人单位应将打造家庭友好的工作场所纳入单位社会责任,依法保障劳动者正当权益,构建支持工作生活平衡的单位文化,为员工提供支持性的组织环境,缓解男员工生育养育和职业发展的冲突。(作者系中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

打造家庭友好性别平等的工作场所

观点市场

新冠疫情对生育率影响 如何应对

原新 张圣健

全球正在经历新冠疫情大流行,在疫情造成高死亡数量和社会封闭状态所带来的心理冲击、经济衰退、停工停产以及对未来生活预期不明朗和信心减弱的综合作用下,生育率已经呈现下降趋势。

疫情对生育率的影响,包括几个方面:死亡、封闭、疫情反复且长时间流行,加剧了经济社会动荡,居民长期生活在恐慌和焦虑情绪之中,将影响生育认知态度。疫情带来严重的经济衰退,导致家庭生育意愿明显下降。疫情还可能通过多种方式直接损伤生育能力或影响生育行为,如可

能对男性生殖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医疗资源供给紧张,减少了生育治疗机会和避孕药具的获取频率;提升了人们的抑郁症水平;封闭或隔离管理方式,改变了夫妻团聚时间。统计数据表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美国、部分欧洲国家以及一些亚洲国家已经出现明显的生育率下降现象。

疫情发生在中国生育意愿疲软、生育基数萎缩、生育行为消极的大背景下。期间,结婚登记人数下降,普遍接种新冠疫苗推迟了部分家庭的生育安排,这与近年来中国生育率的持续性下降趋势叠加,加速了年度出生人数的减少。

疫情过后的中期阶段,由于政府出色

的疫情应对和快速恢复的经济增长,再有更加宽松的生育政策,预计我国未来生育率相比发达国家将具有更强的反弹动力。但是,未来生育率回升的能量、程度和周期都不容乐观。

我国已经在低生育率道路上行进30年,如果未来生育率不能回升到更替水平以上,走入总人口负增长通道,人口负增长态势将会长期持续下去,生育率越低,人口负增长的速度越快,人口规模的降幅越大。短时期的过低生育率尚可接受,长周期的过低生育率要绝对避免和超前干预。从灾后中期预期来看,因疫情而推迟生育的补偿效应将对新增生育的刺激效

应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提升生育率,再加上三孩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启动,二者形成合力能够为生育率回升创造机会。机会能否变为现实,正在考验政府应对疫情的能力、措施和效果,考验政府生育相关的社会公共治理行动和能力。

当前和未来的关键和重点要切实行动起来,推动新生育政策和老龄政策有效落地,夯实推动生育水平适当提高的经济、社会措施等保障基础,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作者原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张圣健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